

立會選舉更應聚焦扶貧民生

何子文

香港脈搏

香港扶貧委員會日前討論《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報告結果令人驚訝。儘管政府近年扶貧力度有增無減，本年度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預算為1057億元，超過教育成為政府支出最多的政策範疇，但實際效果卻不顯著，本港去年貧窮人口高達165.3萬，貧窮率達23.6%，較前年增加16.2萬人，創自2009年有紀錄以來新高。同一時間，香港仍然有20多萬人居住在劏房陋室，多年來他們的居住問題仍然未有改善。

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全球前列的富裕城市，竟然四個港人中就有一個貧困人士，仍然有大批市民居於劏房籠屋，在日進斗金的大都會，不少人卻分享不到經濟發展的成果。香港扶貧「愈扶愈貧」，當中固然有疫情、「黑暴」等因素，但也表明以往「救濟式」的扶貧方向，只能夠產生短期作用，市民「復貧」「返貧」的情況仍然嚴重。

扶貧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工程，不是一味增加資源、加大扶貧力度就可以解決，當中包括房屋、社福、教育、稅制、再分配等一系列社會政策。更重要的是，扶貧需要全盤的戰略和計劃，需要政府以堅定的決心和意志，迎難而上，打破既得利益者的掣肘。然而，香港扶貧工作一直缺

乏方向，缺乏戰略，每年的財政撥款愈撥愈多，但成效卻極微，這說明香港的扶貧方向可能出現問題，社會需要就香港的扶貧工作、方向、戰略進行一次大辯論。

立法會選舉的重要功能

事實上，立法會選舉正是一次公共政策的辯論，不同界別，代表不同聲音、代表不同利益訴求的參選人，就着不同公共政策提出倡議、互相辯論，從而讓社會聚焦於政策方向，為香港的民生問題尋找出路，這才是立法會選舉的一個重要功能。然而，今次立法會選舉，一些坊間意見仍在糾纏於有多少非建制派參選，有那些人提名，以及反對派政團不參選後投票率如何等問題，這些問題不是不重要，但卻不是最關鍵。雖然反對派政團不參與，但大批非建制派同樣報名參選，參選人背景多元、訴求多元，所謂「清一色」不攻自破。至於競爭性，今屆選舉競爭激烈程度較以往更甚，外界的一些質疑根本沒有道理。

與其關注這些捕風捉影的政治議題，不如要求參選人就各種經濟民生問題多提意見，就如扶貧問題，現時香港出現「愈扶愈貧」的情況，參選人不要一味口號式要求政府增撥資源，更應就扶貧戰略提出意見。

例如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精準扶貧」扶貧戰略，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大數據等科學方法弄清扶貧對象，並加以各方面的扶持，其中包括人才支援、資金支持和社會參與等，因地制宜，因人施策。中國的扶貧方式發生重大轉變，成功打贏了脫貧攻堅戰。

內地扶貧經驗主要有四點：一是將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舉全國、全社會的力量解決貧困問題；二是推進經濟社會包容性發展，有針對性地制定扶貧政策；三是將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有效結合，構建全政府、全社會的「大扶貧」格局，努力攻克消

除深度貧困的「最後一公里」；四是減貧實踐始終以貧困人口為主體，強調扶貧與扶智、扶志相結合，幫助貧困人口徹底脫貧。

這些經驗香港能否學習？香港如何制訂扶貧戰略，如何改變「大市場小政府」的局限，發揮政府力量推動扶貧？以至再分配、房屋扶貧等政策，同樣需要有一個全社會的討論。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管治的重要一環，參選人更應拿出具體政綱，提出具體倡議供大眾商討，共同破解香港的民生困局，這才是立法會選舉最應聚焦的地方，而不是糾纏於政治議題，捨本逐末，並無意義。 (H)

中美各取所需重回合作

學研社成員、時事評論員 吳桐山

學研集

近期格拉斯哥氣候峰會上，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指出，即使在現今全球升溫1.2攝氏度的情況下，救援人員已經難以跟上不斷增加的災害數量步伐。從2000年到2019年，全球記錄了近7000起災害，與20年前相比增加了83%；洪水同比增加134%，極端高溫事件同比增加了232%。

應對全球氣候危機關鍵時刻，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11月10日，聯合宣布了《中美關於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雙方在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考慮各國國情的基礎上，採取強化的氣候行動，有效應對氣候危機。

此次宣言的簽訂，是貿易戰以來，兩國第一次在重大的問題上取得了合作，意義重大。但也是一個必然，可以這麼說，此次兩國的合作無論是對國際上還是對於兩國本身，都是一舉多得的結果，各取所需。

現在美國通脹很厲害，美國10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達到1990年以來最大，超過預期水平，進一步表明隨着企業通過漲價轉移成本壓力，美國物價上勢頭不斷升高。美國勞工部發布的數據顯示，CPI同比增長6.2%，環比升幅0.9%，這兩項數據均超過參與調查的所有經濟學家的預期，跨入嚴重通脹門檻。

有人說美國通脹有一部分是中國輸入的，實則不然，疫情期間美國大量「放水」，搞去全球化，加上特朗普任內弄出來的貿易戰，在加徵關稅方面最終還

是反噬到美國消費者身上，最後只能民眾自己吃了這個「苦果」。所以當下美國是有必要跟中國合作來緩解自己的通脹問題。可以預測下一步雙方有可能在關稅方面會有所鬆動，這樣對緩和雙方的關係是有好處的。

中美各有經濟難關

中國現在對內正處於一個經濟轉型調整期，對許多行業加強了監管，如房地產方面要房住不炒，整個經濟是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的。特別是今年下半年以來，現在一些經濟學家預測明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會在5%左右，相對來說是一個較低的水準。

對外，中國出口的貨運量最近幾個月增速是往下降的。9月份以後，東南亞國家疫苗接種率上來了，開始開工復產，隨着歐盟和東南亞「與病毒共存」成為常態，包括歐盟社會供應鏈瓶頸的問題解決，那麼中國的出口增速就有很大回落壓力，這樣的轉變結果導致中國對發達國家消費市場的依賴轉向內需，中國14億人口能消化嗎？

總的來說，雙方都有各自的經濟難關，大家都有必要緩和一下緊張的關係。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今日舉行視像會晤，外界關注中美關係在會後能否有所轉變。要理性地認識到，中美兩國確實在一些重大的地緣政治上有矛盾，一直以來分分合合，這是很正常的。希望兩國領導人的會晤令緊張的中美關係穩定一些，中美只有相互合作，無論對世界還是對自己都是最有利的。

愛國者治港助港青開闢新天地

中國僑聯委員、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智庫主席 莊守瑩



11月8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引起熱烈反響。作為香港年輕代表，感到自己能生於這個年代十分幸運，見證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希望能在大時代把握機遇，為祖國的強大貢獻力量。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悲慘歷史，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黨給了中國新希望新方向，開始了百年艱苦輝煌的征程。今年是建黨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就，舉世矚目。

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涉港部分，主要有以下幾句話：「在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上，黨中央

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為推進依法治港治澳、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礎。」

話雖然短，但鏗鏘有力，道出了香港事務的核心，標誌「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新時代到來了。這是香港邁向新時代的轉捩點，區分了香港的舊時代和新時代，也是香港人心回歸的新里程。香港國安法、愛國者治港、香港政制改革的實施，解決了許多長期難以解決的難題。我對前景充滿信心，香港必定能利用「一國兩制」賦予的獨特角色，在第二個百年中取得輝煌成果，為國家、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而香港年輕人，絕對不能在百年一遇的重大機遇中缺席，應抓準定位，在中國大地上好好幹一番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編織自己的中國夢。

深港航運業合作前途宏大光明

中藍海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粵港澳大灣區遊艇行業聯合會主席 文煥

大灣區海洋專欄

香港特首新的施政報告提出要建設北部新都市，通過東部大鵬灣康樂旅遊圈、中部河套區域密切交流圈、西部前海創新圈，把香港和深圳綁定融合發展，形成「雙城三圈」發展格局。在這樣一個新的格局下，香港主動提出對接深圳發展，深圳如何應對和作為，這不僅是兩地發展計劃，更是「一國兩制」的國家戰略。個人認為，利用香港和深圳的優勢，借鑒香港180年的國際航運經驗來發展深港海運服務業，打造全球海運規則的新高地。

國家「十三五」規劃明確深圳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支持深圳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如何

理解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很多人把海洋城市與海洋中心城市等同，中心二字非常重要、尤為關鍵。深圳是海洋城市，但要做到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有三點必須達到：首先，深圳在涉海領域能夠支撐中國具有全球海洋規則和技術標準制定的話語權，尤其是國際通行的海運規則制定方面應該有所作為。二是深圳應該在涉海領域科技創新方面全球領先，是技術創新的高地，對於傳統的涉海領域可以有有所為有所不為。第三，深圳的涉海產業、海運服務業應該作為海洋城市主導產業，佔有絕對的優勢比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已成為深圳未來的發展重點，深圳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部署和行動綱領。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層級是目前最高的定位，這是深圳前所未有的責任擔當。當我們考察這些方案和落地措施的時候，從深港新發展格局的視角下，深圳提出的海洋中心城市的特徵內涵和目標任務，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

比如，深圳建設海洋中心城市對港航未來創新發展沒有足夠的重視，其實航運業本來就是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基礎行業，海洋大國都在爭奪海洋治理機制，海事的規則、航運的標準的制定權，因為它才是國際海事最重要的話語權。

再比如，深圳海洋大學的學科設計方案當中，我們留意到港航海事、航運服務業未被列入，海洋大學籌建顧問會名單中沒有港航的專家，這忽略了海洋軟學科。海事管理、航運管理、規則標準、海洋金融和保險等，建議把這些填補國內空白的學科補上。

借鑒香港航運業成功經驗，是深圳向海經濟最佳的實施路徑，也是國內與國際慣例銜接最好途徑之一。譬如通過深港聯手合作推動國際船舶登記，實現「中資方便旗船回國登記」，就可以解決長期困擾中國的需要解決而解決不好的問題。具體做法：在大灣區範圍內率先構建「一船兩港」合作模式，

把香港港和深圳港視同灣區物理大港的兩個碼頭，通過設立深港聯辦機制，實行船舶一次查驗通關、一次引航進港的便利化監管作業，降低國際船舶的通關成本，提高深港組合港對國際船舶的吸引力。我們大灣區遊艇行業聯合會在推動國際遊艇旅遊自由港，落實粵港澳遊艇自由港，建議在大鵬灣開展國際遊艇登記創新試點為「完善國際船舶登記制度改革」提供先行經驗，這與香港提出的「大鵬灣-印洲塘建設康樂旅遊生態圈」的規劃圖不謀而合。

貫徹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根據「十四五」規劃的部署，在深港新格局下，兩地融合發展、合力進取，提高深港合作領域的水平，按全國性、國際化的要求，服務全國、輻射全球。深港合力提升在國際航運服務方面的地位和專業化水平，鞏固和提升國際航運地位，更好地維護國家權益和保障產業的安全做出更大的貢獻。

山西拿出真招實招優化營商環境



「山西的營商環境較過去有很大改觀，城市發展令人驚訝，銅鑼灣正在山西多市布局投資。」在今年的一場灣區企業家投資考察活動中，香港銅鑼灣集團董事局主席陳智盛讚山西投資環境，談到與山西未來的深度合作，更是信心滿滿。

成功走出「山西路徑」

營商環境好不好，群眾和企業說了算。山西營商環境的好口碑，是一系列改革舉措的成效體現，是各項改革持續推進的綜合效應。

近年來，山西打出創優營商環境「組合拳」，在開發區大力推行「承諾制+標準地+全代辦」改革，為企業提供「保姆式」「一對一」服務。

與此同時，山西持之以恆將優化營商環境的各項配套政策向前推進，使得省域競爭優勢不斷積累，企業投資信心不斷提振。

山西對標對表國內外最先進的制度政策，以市場主體的痛點難點為發力點，持續打造高標準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走出了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的山西路徑。

催生亮眼成績單

栽下梧桐樹，引得鳳來棲。近年來，山西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加大外資促進力度，吸引了空氣產品、福特汽車、百度、華潤、秦淮數據等一批知名企業落戶山西，成功引入富士康手機主機、主板模組維修等一批加工貿易產業轉移項目，有137家世界500強企業在晉投資興業，利用外資穩定增長。

如今的山西，營商環境為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插上了騰飛的翅膀。數據顯示，2020年山西省實際利用外資16.91億美元，同比增長24%。2021年1—8月，全省新註冊外商投資企業88家，同比增長66%；商務部口徑實際利用外資2.3億美元，同比增長44.3%。

「我們就是要拿出真招實招，讓在山西投資興業的人，辦事情有『靠制度不靠關係』的社會氛圍，搞項目有『承諾制+標準地+全代辦』的優質服務，做前期有『一枚印章審批』的便捷便利，跑手續有『7×24小時不打烊』的政務服務超市，對未來有『新官理舊賬』的穩定預期，讓安商親商富商在三晉大地蔚然成風。」進博會上，山西省投資促進局局長楊春權向僑台資企業代表的一番推介，讓在座客商深刻感受到，隨着營商環境的不斷升級和優化，山西「走出去」「引進來」的底氣越來越足。

合肥高新區經濟發展行穩致遠

風雲激蕩三十年，國家級高新區行穩致遠。作為安徽創新驅動發展的領航者，合肥高新區櫛風沐雨、砥礪奮進，完成了從0到1、從1到N的雙重跨越，已經連續七年站穩全國高新區前十。今年上半年，合肥高新區經濟總量實現時間任務「雙過半」目標，在市政府考核15項重點經濟指標中，合肥高新區有9項位居開發區第一。

合肥高新區經貿局提供的數據顯示，1至6月，合肥高新區GDP達618.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19.3%。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38.9%，進出口總額預計增長6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21.1%，分別兩年平均增長20.7%、28.7%和12.9%。

總體而言，合肥高新區上半年經濟運行持續向好，主要指標高位增長。其中，GDP、規上工業增加值、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規上服務業營收、工業投資、進出口總額、城鎮居民收入等9項指標，增速位居開發區第一；規模以上服務業營收總量及增速均位居全市第一。

主要經濟指標高位增長

把目光放遠，縱覽合肥高新區「十三五」經濟運

行歷程，不難發現，這個國家級高新區表現搶眼，各項指標增長迅速。2020年實現GDP1101.3億元、規上工業增加值687億元、實新產業產值1075億元、規上服務業營收491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20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9.9億元，分別是「十二五」末的2.18倍、2.08倍、1.93倍、1.94倍、3.4倍和2.85倍，分別年均增長16.8%、15.8%、11.5%、14.2%、27.7%和23.3%。市場主體增至5.5萬戶，年均增長高達31%；自主培育上市企業27家，同比提升68.7%。

再往前看，合肥高新區一路突飛猛進，工業總產值2009年突破400億，2010年突破600億，2011年突破1000億。到「十二五」末，全區實現工業總產值1527億元，在科技部火炬中心的國家高新區綜合評價中排名第八，成功躋身全國高新區第一方陣。

在實現總量提高的同時，合肥高新區經濟發展質量也相應得到提升，展現出工業經濟產業結構優、發展韌勁強的特點，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佔全區工業總產值的比例超過75%，二三產佔比達到57:43。這些數字既展示了合肥高新區「三十而立」的業績，又彰顯其未來高質量發展的底氣。